

● 盧瑋鑾

前言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才停止活動，時間橫跨了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初，是本港第一個最具規模的現代文學團體。它成立於中國烽火連天的抗日期間，可以說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一個重要分支，要研究抗戰文藝及「文協」的歷史，絕不應遺漏這個部分。可是，因為資料缺乏，歷來沒有人作過詳細的敘述和深入探討。為了填補這段空白，現試利用在香港能找到的資料，排比整理，以求反映該會的組織及活動情況，及中國文藝工作者在香港留下的痕迹。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

(一九三八—一九四一)

組織及活動

第一節

籌備經過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掀開正式抗日戰爭後，由於敵人瘋狂轟炸，各大城市均受到威脅和破壞，有些更淪於敵手，文化界中人流亡四散。為使文藝工作力量集中於抗敵救亡目的上，為配合抗戰的現實需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漢口正式成立。

為了團結散居各地的文藝界，發揮更大的抗戰文藝宣傳力量，該會決定在各地成立分會或通訊處①。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後，部分文藝工作者到了香港，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失守，華南地區頓失了一個重要文化據點，更促使文化人紛紛南來，使香港成為全國人才薈萃之地。

該會理事會對此十分重視，很快就通過組織部的建議，推定了樓適夷、許地山、歐陽予倩、戴望舒、蕭乾等為香港分會的籌備員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③，總會組織部副主任樓適夷到了香港，籌備工作大概便告展開了。

雖然，在總會工作紀錄中，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理事會議決函聘總會留港理事許地山，作家戴望舒、歐陽予倩、簡又文及組織部副主任樓適夷等，積極籌備④。但早在此正式函件傳遞到港前，在香港報紙上，已有一系列文字，呼喚文藝界團結，為組織分會，製造輿論。首先是林煥平，在《一點小意見》⑤一文中，認為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對總會發起「除奸及清除妨害抗戰的書報刊物運動」反應冷淡，感歎「我們也可以做到的工作，倒也不少。但是我們卻做得太少了。」

「更覺得：

「有有些人真是還像彼此不知道同住在一一個地方。這樣隔膜，對於抗戰，是有些我們可以做得到的工作，我們都沒有做了；對於我們自己，也是失去了學習、觀摩與研究的機會。」

我們的接觸，聯絡感情，自不必一定有一個甚麼團體，掛起一個堂皇冠冕的招牌，……但是一個月半月一回，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大家集起來喝喝茶，交換交換見聞，這是很有益的吧，也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吧？⑥」

林煥平雖然說「自不必一定有一個甚麼團體，」但這只是個「以退為進」的辦法，因為該文刊出後，不久便出現了譚冷霞的《再來一點小意見——關於林煥平先生的建議》⑦，謝子真的《也來插嘴》⑧，郁彬的《響應——讀林先生的〈一點小意見〉後》⑨三篇文章。其中謝子真文章已進一步說：

「我以為雖然只是喝喝茶，有經常的固定時間總比較好些。」

郁彬文章中，就出現了林煥平文中沒有用過的「香港文藝界的團結問題」等字眼，更強調：

「我們應該團結起來，適當的、穩健的替祖國盡點力量吧。」

在這種循序漸進的推動下，樓適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就文化工作者的團結問題，發表了《我的意見》⑩，表示對香港的文化工作者的散漫態度不滿。他認為：

「在香港，處境至少要比上海好些，對國內的接近，也比上海方便，大家也不是不在工作，只是各自為戰，因此效果是非常的稀少，許多文化工作，一天比一天的表現著對抗戰的遊離。」

⑪

然後，他提出了：

「在原則上我自然主張堅決地執行已經在內地普遍展開著而且已經收了很好效果的統一戰綫的政策，號召一切站在抗戰救亡的立場上的文化工作者都集中在一個旗子之下，但事先似乎還應該有一種預備的工作，就是由幾個比較接近比較進步的工作者先有一種聯繫。不妨用聚餐會，座談會，或俱樂部的方式作經常的集合，掃除相互之間的隔閡，討論一些目前的迫切的工作上的問題，解決許多工作上的困難。」⑫

「堅決地執行已經在內地普遍展開著而且已經收了很好效果的統一戰綫的政策」，「文化工作者都集中在一個旗子之下」，這種說法已十分明顯表示了一種未來路向。但他仍如林煥平的文章一般，說「不妨用聚餐會、座談會或俱樂部的方式作經常的集合。」三天後，黃繩就緊接作了補充：

「召集的時候是『不妨用聚餐會，座談會或俱樂部的方式』，但必須準備好一個切實可行的工作的綱領，作為號召，並作為聚集時的討論中心。」⑬

文章最後更清楚地說明：

「所謂文化工作者的大團結，不需要是不分部門的千百人集攏來喝喝茶，交換交換意見；而要的是各部門的工作者，在統一戰綫的原則下，聯繫起來和加緊工作。」⑭

這樣，文化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和方式，輪廓已愈來愈清晰。

自適夷《我的意見》刊出後，《立報·言林》上，便出現和應，其中包括了下列各文：

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王劍鳴《幾個緊要的工作——文化工作者的團結是前題》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黃繩《活力的提振——對香港文藝界獻議之一》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鄭郁郎《我的意見》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拉特《我的補充》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林螢聰《建立作者座談會》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黃繩《黑暗的克服——對香港文藝界獻議之二》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黃繩《落後者的爭取——對香港文藝界獻議之三》

這些文章，除黃繩三文對香港文藝界具針對性外，其餘可說無甚新意，但卻形成一種聲勢，襯托出「衆人的意願」。同時，

在這響應聲中，葉靈鳳以《言林》編者身分，透露「文化工作者大團結」的進展情況：

「對於這建議的實現；本港文藝工作者已經有幾位分頭在準備工作。因了這裏環境的特殊，我們必須取得成熟的客觀條件，然後這工作才可以順利進行和開展。編者希望將來，在這團結之下，除了『喝茶、談天』之外，本港的文藝工作者可以加緊各人的工作和自我批評，監視敵人漢奸的文化陰謀，爭取本港的落後文人和讀者。此外，更和國內的文藝組織取得密切的聯繫，使這孤島和祖國抗戰氣息的阻隔，能夠從這上面流通起來。」⁽¹⁵⁾

如此，「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已呼之欲出了。

第二節

成立目的和組織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許地山、樓適夷等十八人在香港勝斯酒店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後⁽¹⁶⁾，便「決定依據總會指示，成立留港會員通訊處⁽¹⁷⁾」。該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禮堂舉行成立大會。當日主席為許地山，出席的文藝界共七十一人。開會程序除主席報告、籌備會代表樓適夷報告籌備經過、陸丹林朗讀宣言外，更有葉恭綽、許世英（代表汪大燧）、陳衡哲、劉思慕演講，並即席選出幹事九人，組成第

一屆幹事會。

該會既是秉承總會指示組成，故目的及精神必與總會融合。許地山起草的《成立宣言》⁽¹⁸⁾，就強調：留港會員

「必須變更過去留港同人們各自為戰的方式，而一致歸於全文協的旗幟之下，立刻團結起來。」

又選擇總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的前夕⁽¹⁹⁾為成立日期，表示對母會的敬意及密切關注。此外，「更希望利用香港這個溝通國內外聲氣的中繼站地位，在積極方面，多做點國際宣傳工作，在消極方面，應該盡量的檢舉失敗主義者以及發和平謬論的漢奸，和敵人的種種宣傳，並隨時予以打擊。」⁽²⁰⁾

會員資格，一切均依從總會簡章，由於初期成立名義是「重慶總會」的「通訊處」，不能在本港招收會員，故：

「有志加入者，該通訊處自可代為向重慶總會申請入會。凡是有志從事文藝工作而有兩個會員介紹者，經過理事會通過手續，即為會員。」⁽²¹⁾

其實「自可代為向重慶總會申請入會」，只是逃避香港法例的手法。利用這一方法，該會就在本港招納了許多新會員。有關該會組織及人選，現分述如下：

第一屆⁽²²⁾（一九三九年度）

（一）幹事九人：

樓適夷、許地山、歐陽予倩、戴望舒、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衡哲、陸丹林。

（二）候補幹事二人：



嘉達公司

彩色、黑白柯式製版

● 服務週到

● 準時交版

● 收費公道

地址：香港鯉魚涌英皇道一〇二六號
海景樓十一樓（10字）D 21
電話：五—六二二四三八

陳占元、簡又文。

(三) 研究部及其負責人：

(1) 藝術文學——許地山、陳衡哲。

(2) 雜誌文學——劉思慕、陸丹林。

(3) 西洋文學——戴望舒、馬耳。

(4) 電影戲劇——歐陽予倩、蔡楚生。

(四) 《文協》周刊編輯委員會：

李馳、陳占元、吳景崧、戴望舒、

樓適夷、袁水拍、陳適懷。

第二屆^{②③}（一九四〇年度）

(一) 理事九人：

喬木、許地山、楊剛、戴望舒、施

蟄存、葉靈鳳、袁水拍、黃繩、徐遲。

(二) 候補理事五人：

馬耳、端木蕻良、林煥平、陸丹林、

劉思慕。

(三) 各部及其負責人：

(1) 總務部——許地山、袁水拍、徐

遲。

附設「經濟委員會」——委員七

人：許地山、陸丹林、簡又文

、郁風、馬耳、馮亦代、徐遲

(2) 組織部——葉靈鳳、黃繩。

附設「文藝通訊部」——黃繩。

(3) 宣傳部——施蟄存、戴望舒。

附設「編輯委員會」——葉靈鳳

、陳畸、楊剛、戴望舒、馬耳

(4) 研究部——喬木、楊剛。

附設「文藝座談會」——喬木、

陸丹林。

附設「文藝研究班」——施蟄存

、端木蕻良。

附設「文藝指導組」——楊剛。

(5) 文化服務部——袁水拍、馮亦代

。

(待續)